

第一章 生于山乡 留学美国

家 学 渊 源

吴国桢的家乡在湖北省的建始县，此县与四川省的巫山、奉节两县相毗连。从地图上看，建始县位于著名的巫峡风景区以西，由于它过于偏僻，以致住在江汉平原的人，有的还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县。吴国桢 29 岁当了汉口市市长后，有些报刊竟把他的籍贯随意乱写，说他是恩施人，有的记者把他的出生地从长江以南搬到长江以北，说他是郧西人。为此，吴国桢只好在名片上，特地印上“湖北建始”四个字，既含有更正的意思，也示不忘故乡。

建始县多山，平均海拔千米，山势起伏，峰峦迭嶂，山上巨树参天，浓荫蔽日，远处望去，犹如无数盘曲在地的青龙，连绵无涯，直通天际。

山坳之间，白云盘绕，林木深处，炊烟袅袅，驻足远眺，景物绝佳。明代有位诗人形容建始的自然景观是：“白云原在众山巅，山过白云更截然。一路不曾见平地，此行真是上青天。花开峭壁初过雨，雪积阴崖不计年。木石萧寥人意古，时从岩穴望炊烟。”^①就是建始县天然景物绝妙的写照。

有些地方的原始森林，除采药、觅菇和狩猎者外，人迹罕至。陌生人如果冒冒失失地闯了进去，很少有人活着出来，不是因迷

路饿死冻死在森林里，便是被虎豹豺狼所分噬。因为野兽伤人的事，时有所闻，老百姓吓唬孩子的口头禅，便是“野人家家来了”（湖北方言称外婆为“家家”）。

两山之间溪水潺潺，绕流堂前屋后，乡民们竖木为架，用木头制成圆轮，将竹筒缚于轮周，口皆向上，置流水中，水激轮转，筒载其水，旋转而上，注于木笕，引入梯田，种植水稻。坡地则种玉米、红薯、瓜类。无论水田或坡地，单产都很低，一年亩产不过一二百斤，而且全靠“望天收”。

高山与次高山之间，每每夹着一块平坝，大一些的年长日久便形成市集，小一点的就是民居之地。乡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些深山老林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这儿并非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乡民们一般都很苦。

吴国桢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从江西迁湖广荆州江陵，继迁监利。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长江大水，始祖吴大智再迁四川奉节，转徙恩施。吴大智之次子吴士安经商致富，置田宅于建始县红岩寺之凉水埠。从他开始，世代居此。1903年10月21日（农历癸卯年九月初二），吴国桢诞生在这四周环山、溪流交汇的凉水埠。虽然吴国桢在建始只度过了童年时代短短的6年，踏上政治舞台后，又以文官名世，但乡民们那种狷介耿直、有礼勿让、好斗任性等朴实性格，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地仍留下某些印记。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1876—1970年），早岁考中秀才，清末被地方当局选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

经心书院是两湖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他之所以创办这所学堂，其目的是要实现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他管辖的湖南湖北境内，招来一批年轻的秀才，培训二三年，然后根据他们的成绩，送到国外深造。

张之洞在担任两湖总督之前，曾出任过湖北提学使，对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他办的这所书院，条件相当好，学生入院后，每

人住斋舍一间，按月发给膏火费库银三两，折合银元为四元五角（库平银六钱合一枚银元），作伙食费和杂用费。当时伙食费用极廉，每月三元已足够，剩下来的一元五角，尚可留作零用。

学生的衣服鞋袜，也由院方按季分发，每年还发蓝布袍和黑马褂各一件，给学生作礼服。至于笔墨纸砚，一概免费供给。每月举行考试一次，按照考试成绩，给予奖励，超等的 8 元，特等的 6 元，中等的 4 元。一般穷苦学生，每月所得奖金，已足够养家糊口了。

经心书院的学制，视学生的学业而定，二到三年不等，结业后，挑选其中学业优秀的，送往日本或欧洲深造，其余的分派给两湖各地衙门、学堂等单位，量才录用。

那时，家长们囿于“父母在，不远游”的旧观念，许多人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背井离乡，出国学习。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办法，阻挠或影响自己的子弟，避免被送出国，所以才出现了有的人学了四五年还不能结业的怪现象。

为了解决“父母在，不远游”这个矛盾，张之洞力主把学生的家庭安顿好，规定留学生的待遇应高于在国内工作学生的待遇，每月发 20 两银子贍家，使父母妻子无衣食之虑，使学生无后顾之忧。

吴经明学习结业后，被选派赴日本，与李书城、何成浚、孔庚、耿伯钊等人一起，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当他们从汉口江岸登船出发时，张之洞亲自率领僚属到江边为这些学生送行，勉励他们要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回国后忠君报国。岂料几年之后，这批学生一个个都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党。

由于有留学日本的这段经历，吴经明结识了许多尔后在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张知本、蒋作宾、何成浚、程潜、何应钦、阎锡山等，为其子吴国桢弃教从政奠定了基础。

吴经明 1908 年学成归国，与何成浚等人被分派在北京陆军部

段祺瑞属下任职，从教育科长一直做到军学司司长，官虽不算显赫，但地位重要，各省陆军的军费、军需、军械的分配数字，最后都汇总到吴经明手里，或增或减，事关重要，因此，连督军们对他也卑词示恭。民国初年，山西都督阎锡山，经常以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名义，派人到北京吴家走动，或手札问候，或送钱送礼，为的是想多争取一点军费、军械。

吴国桢 3 岁时进建始县凉水埠私塾读书。他生性聪颖，领悟力又强，不数月，《三字经》不但能从头至尾背诵，甚至还能倒背如流。接下去学《百家姓》、《千字文》、《二十四孝》、《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他不但背诵得琅琅上口，而且还能解释其中的某些故事，因而轰动了小小的山村，颇受塾师钟爱，族人都称赞他为“神童”。

1909 年，吴国桢的叔叔吴经铨，从日本留学归来，返乡探亲，趁机将他们母子 3 人（母朱芷英、兄吴国柄、吴国桢）护送到北京，与父亲吴经明团聚。兄弟俩先在家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就读，后到大兴县两级小学读书。

几年后，他的哥哥吴国柄（长他 5 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翻阅哥哥的课本，有些功课也跟着吴国柄一起做，久而久之，他的程度与乃兄差不多，有几门课甚至比哥哥还要好一些。吴经明得悉后大喜，决定把幼子也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去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那时，15 岁的周恩来也考入南开中学就读。看见吴国桢年纪小，有些生活上的事往往难以自理，一向“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⑦的周恩来，便以大哥哥的身份，对吴多方照顾，学习在一起，外出在一道，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倍增，情同手足，后来成为异姓兄弟。

1914 年，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忠于职守、喜欢群聚、联络感情”之意），会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探求真理”；“辨难析疑，辄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书之不及”。由于宗旨鲜明，又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采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因此，在当时南开中学的四大学生团体中（另外三个是“自治励学会”、“三育竞进会”和“青年会”），敬业乐群会拥有的会员最多，影响也最大。

吴国桢入会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活动能力提高很快。原来性格内向、羞于与人交谈的吴国桢，后来竟在演讲比赛中获奖。周恩来任会长时，他任童子部部长。

在校期间，为了留一纪念，周恩来和吴国桢还合摄照片一帧。这张照片经过 80 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还悬挂在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当时的南开学校）里。照片的画面是：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携着手，面露笑容，状极愉快。

考入清华

从南开学校分手后，周恩来东渡扶桑，寻求真理，吴国桢考进了清华学校。

当时，吴经明只是个小京官，家境属于中等。差强人意，他的长子吴国桢，那时已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就读，如果再要负担吴国桢的学费，未免捉襟见肘，难以筹措。好在吴国桢的功课很好，吴经明与妻兄朱和中商量后，决定让吴国桢投考免费的清华学校。^④

那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的

“余额”(即‘实属过多’的那部分,约一千零七十八万余美元)办起来的,它在各省的招生名额,也是根据各省分担庚子赔款份额的多少,按比例分配,如江苏省(包括上海在内)的赔款最多,分配 26 个名额,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赔款最少,每省各招收两名。湖北的名额也不多,最初只有 4 名,吴经明坚信其子的功课足以考上清华,决定让吴国桢在人数众多的考生中去“角逐”。

清华的考期定在 7 月中旬的某日,那时,正值张勋带领辫子兵入京,拥戴溥仪复辟。不久,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张,张勋眼看覆灭在即,纵容部下奸淫抢劫,胡作非为。当时,北京市面异常混乱,商店停止营业,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交通陷于瘫痪。从东四牌楼的吴寓到西直门外海淀的清华,路程很远,又雇不到骡车或人力车,吴经明很不放心,但又怕误了考期,因此,派了两名士兵护送。他耽心吴国桢长途跋涉,体力消耗过大,影响考试成绩,还特意吩咐两名士兵,轮流将他背到清华赶考。

清华学校那时实行的是八年制(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结业后的程度相当于正规大学的一二年级。学制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学生们日后到美国去好插班学习。

吴国桢这时还不到 14 岁,由于他读过 4 年天津南开中学,所以报考的是高等科。高等科中结了婚的学生大有人在,吴国桢是高等科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吴国桢考入清华之日,正是该校严格考课之时。为了适应美国学校的需要,对“西学”(外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越抓越紧,每堂课都考试。老师一走进课堂,就发给一张白纸,进行 10 分钟的测验。其它如外语,每次上课都要提问,弄得学生惶恐不安。而国学课一律放在下午进行,由于学生紧张了一上午,下午精力不济,打瞌睡的,埋头赶做上午作业的,比比皆是。

清华学堂在 1916 年以前,同其它学校一样,也是采用百分制,

60 分为及格线。但从 1917 年起，改为 70 分算及格，平均成绩不到 70 分的要留级。到 1918 年，有位美国教师建议：采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科学计分法”（或称“等数计分法”）。这种计分法把学生的成绩分为六等，即超等、上等、中等、下等、末等、不列等。这六等的评分有一定的比例，在 100 名学生中，超等的只能有 5 名，所以竞争特别激烈，每次考试，总有几个幸运的，也总会有一些倒霉的（下等、末等、不列等）。几年学下来，开除、退学和生病死亡的，约占 $1/4$ 左右，淘汰率很高。吴国桢仗着基础好，领悟力强，身体又棒，每年几次大考，总是名列前茅。

说他身体棒，还得力于初入清华时一次意外的“际遇”。清华有些高年级同学，从美国学校学来一种欺负新同学的方法，名曰“拖尸”（toss），就是在新同学入睡之际，几人结伙闯入他们的寝室，用被子把人裹住，使劲将新同学抛向空中，以此取乐作耍^⑤。吴国桢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个“湖北佬”，尽管他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被高年级同学高高抛起，一边抛、一边喊：“吴国桢，九头鸟！看你求饶不求饶！”作弄戏耍够了。才唢哨离去，使他愤愤不已。从这以后，他下决心锻炼身体，田径、球类、单杠、双杠，他都练几下。加上当时的清华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每到课外活动时间（下午 4 时到 5 时），除体育馆外，其它房舍一律上锁，并且还硬性规定：五项运动（一、百码赛跑 14 秒；二、半英里赛跑 3 分钟；三、掷铅球 20 英尺；四、跳高 45 英寸；五、足球篮球要求懂得有关知识和规则，射箭 10 分以上，这两项中任选其一）和游泳不及格者，不能留美。

由于这一时期正值吴国桢的身体发育成长之际，他在课余刻苦锻炼，体质大为增强，这就为他日后能适应紧张的工作、具有惊人的工作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终生受益。

吴国桢在清华的 4 年（1917—1921 年），正是我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急剧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时期，1919 年的“五

四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当时，吴国桢不满 16 岁，不及他的同学罗隆基那样锋芒毕露，桀骜不驯。罗隆基每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即 1918 年赶走校长张煜全，1920 年拒绝罗忠诒来校作校长，1921 年不承认金邦正为校长）。在“五四运动”时，罗隆基到天安门发表演说。北京警察厅派人去抓他，罗得到时昭涵同学（清华著名运动员）的保护，才逃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风头。事过之后，有位同学把这件事写成章回小说，登在清华校刊上，标题是：时昭涵威镇天安门，罗隆基独走交民巷。

但吴国桢也并未置身事外；“五四运动”时，在清华体育馆前，他与同学们一道焚烧日货，还参加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的示威游行。从清华园出发，步行到西直门，各校集中后，再步行到天安门，沿途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连嗓子都喊哑了。

吴国桢在清华的后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改变了昔日那种埋头课桌不问窗外事的习性。1920 年，他与其他十几位同学一道，发起组织了政治学研究会。该会每两周开展一次活动，他们研讨过的题目有：“中国政治腐败之点何在？”“督军制之废除”“联邦制是否适于中国？”“中俄通商之必要”等。著名学者梁启超还应他们之邀，到会作过一次题为“中国民族之政治观念”的讲演。通过这些研究和讨论，促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这对他日后从事政治活动，以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都有莫大裨益。

同一时期与吴国桢在清华同学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罗隆基、时昭涵外，还有孙立人、梁实秋、浦薛凤、何浩若、赵敏恒、闻一多、王造时、潘光旦、梅汝璈、冀朝鼎等人。

留 学 美 国

1921 年，吴国桢在清华毕业后，在父亲的陪伴下，由北京乘

火车来到上海，住在四川路青年会的宿舍里。按照当时清华放洋的规定，还必须到上海同仁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办理签证，以及治装、购物、会亲访友等。

吴国桢从封建色彩浓厚的北京，第一次来到上海这座号称远东最大的城市，他跟着父亲逛了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被租界里的那种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商业气氛所震惊，但他父亲却说：“你要了解美国，先要好好看看上海”。因此，他利用在沪办理签证手续的一个月时间，尽情浏览观光这座十里洋场的大都会，当时他哪里会料到：二十五年后，他当上了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

那时，美国制定有歧视华人的排华法案，即“华人除官吏、商人和学生外，一律不许入境”。此外，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故意刁难中国人，如：不乘头等舱的华人，到美国后一律不准登岸，或者原船遣返，或者押到旧金山海边的天使岛羁留所关起来。所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忍痛购买头等舱位，眼睁睁地看着外国船东狠狠地“斩”自己一刀。

8月12日，吴国桢与其他放洋的同学一道，乘坐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上海启程。当轮船启碇后，船上的旅客纷纷用五色纸带抛向岸上，轮船缓缓离岸，纸带愈放愈长，仿佛像离别时的情思，既飘忽不定，又难舍难分。吴国桢与父亲挥手作别，眼泪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下。

12年前，吴国桢跟随母亲和哥哥，从建始乡下坐了六天轿子到宜昌，再乘襄阳号轮船到汉口。那时，他们乘坐的是千吨江轮，睡的是统舱(地铺)，这次乘的是万吨海轮，坐的是豪华的头等舱，一切是那么相似，但一切又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也许是太兴奋的缘故吧，在数十位放洋的中国学生中，有的人第一天就上了个大当。当一位同学走进豪华的餐厅用膳时，侍者递上印刷精美的菜单，满纸英、法文的菜名(那些词汇从未学

过)，不知如何点法，只好依赖侍者。侍者指一个，点一下头，再指一下，又颌一下首，结果照单全点，一共点了 24 道西菜，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吃不光。此事一下子轰动全船，该同学做了一次“洋盘”，在三周的旅途中，成了全船乘客取笑的对象。但吴国桢比较精明，他总是乜斜着眼睛看看邻座的人点什么，他也同样要一份，所以未曾出过洋相。

过了日本横滨，出舱所见，除了云霏苍茫，便是水天一色，偶尔有几只海鸥，绕着船上的桅杆翱翔，景色十分单调，无甚景物可观，只好躺在船舱里，背诵英语，消磨时光。

十天后，轮船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旧称子午线），第一次远渡重洋的中国学生，随着船上扩音器里传来的介绍，一齐涌上甲板，想看个究竟。同学们极目所见，依然是海天相接，其他什么也没有，除了多过一天外，再就是船主为每位头等舱的旅客发一张精美的纪念卡，上面印着轮船经过变更线时两天不同的日期。

轮船抵达美国前夕，船主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称之为“惜别会”(Farewell Dinner)，宴会后就是跳舞，外国旅客一直狂欢到凌晨。而中国学生则心情紧张，如坐针毡，担心明天登岸时美国移民局不知怎样对待？

轮船靠岸后，果然移民局对中国留学生检查特别严格，对你的护照稍有怀疑，就不许登岸，移民局的医生朝你上下不断打量，认为你有砂眼、肺结核等病症嫌疑，就要留下复查。紧接着，海关又来翻箱倒筐，折腾不已，有的人甚至还遭到搜身。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侯德榜，在留学时写的一首诗，就记述了华人登岸时所受歧视的境遇：闻道轮船到金山，华人登岸万般难，伤心最是中华国，到处遭人冷眼看。

当时清华的官费学生，必须在美国学满五年才准回国，每月供给 80 美元的生活费（折合银元 160 元），由清华用一种绿色支票寄给学生。至于学费，则由清华直接向美国学校交纳，不经过

学生转手。

美国中西部的生活费用，较东部为低，留学生每月用在就餐上约 30 元，房租及杂项费用约 20 元，如果不去旅游，又别无其它花销，尚可多出 30 元。家境贫寒的学生，就用它来贍家。

清华保送到美国的留学生，有个不成文的定例，最初的一二年，都送到美国中、西部较小的学校就读，一则学费低廉，再则可以插入较高的班级（如二三年级，个别的甚至可插到四年级），三则在这些学校与美国学生同住，接触的机会较多，以便尽快地适应美国的环境。所以，吴国桢选中了美国中部爱阿华州的格林奈尔学院（后改称大学）。

出国前在上海青年会寄宿时，青年会的职员就劝吴国桢到爱阿华州的学校去就读，因为该州经济富裕、物价低廉，农业生产居美国第一位（玉米、燕麦、生猪等），人民的文化程度甚高，文盲在全美是最少的，其它条件也较中西部各州为好。所以吴国桢接受了他们的推荐，来到了爱阿华州的州立大学——格林奈尔学院。

美国的学制非常灵活，你可以读一个系（称“主修”），有潜力的学生，也可以读两个系（称“兼修”），甚至还有“三修”的。有的学校，一年分成三个学期，本科生每学期选课不得超过 20 个学分，读完 120 个学分，就可毕业。吴国桢在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了两年，主修经济，兼修市政。因为品学兼优，曾荣获金钥匙奖。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 A（最好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饶有趣味的是，尔后吴国桢半生出任省市行政长官，但唯独他的市政课在毕业考试时得了个 B⁺（仅次于 A）。

吴国桢在该校学习期间，是这所学校的网球冠军，还会代表学校出席过全美学生的网球大赛，但终因美国东部各校的强手如林，在初赛时便被淘汰。他趁此机会，漫游了纽约及其附近的各州，了解当地名牌大学博士学位攻读的情况，为到普林斯顿大学

继续深造作出了抉择。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长春藤盟校”之一，它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小城，1746年创办。由于校园内种植了许多“爬山虎”之类的攀援茎植物，它们顺着墙壁向上爬，直到整个墙都被围住，春夏秋三季远望，整个校舍一片青翠，这就是为什么叫长春藤学校的来历，亦表示它的资格老。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都是长春藤盟校，普林斯顿大学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该校出了许多名人，美国的麦迪生和威尔逊两位总统，都出自该校，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前，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和校长。1923年，吴国桢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长春藤盟校这种第一流的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一般都需要刻苦攻读三年，修满36个学分（读12门课，每门课3个学分），学两门外语（这是对美国学生而言，对中国留学生，则是3门，除英语外，还要再学习两门外语）。

当修满36个学分后，还要通过一道笔试、一次口试、一门欧洲语的考试，门门及格，才算是博士候选人，开始选定题目，撰写博士论文。

所谓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写一本书，论文的题目必须是旁人未曾写过的，对论文的质量要求很高，必须对学术界有所贡献。论文写好后，还要经过四道关口，第一道关口是“小修通过”（pass with minor revision），第二道关口是“大修通过”（pass with major revision），闯过这两关后，论文基本上就算定稿了。

为了准备迎接答辩，第三道关口就是所谓“防卫口试”（defense oral），经指导教师认可，觉得学生的博士论文已准备得极为充分，百密无疏，万无一失，然后才叫你交100本印刷成册的博士论文，最后进行论文答辩，经专家学者们投票通过，方授予博士学位。

所以，八十多年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远比现今美国的

制度要刻板、严格，连名满学林的胡适，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论文答辩时，就是因为最后一道关口未获通过，迟至十年后（回国工作了十年）再到美国去，才拿到博士学位的。

吴国桢刚到普林斯顿大学时，生活非常困难，由于纽约及其附近各州的物价，远较爱阿华州为高，房租又特别贵，每月80元的官费，不够食宿开支，家中又不可能寄钱给他（那时他的哥哥吴国柄在欧洲留学，需家中接济）。当时，留学生都埋头考学位，不时兴打工赚钱，所以，到了月底，有时只得以价钱最便宜的饼干裹腹。

环境虽然艰苦，但并没有影响吴国桢的学习，相反，他整天扑在图书馆里，学习更刻苦，劲头更足，为的是能尽早地争取拿到奖学金，改善自己的处境。

那时，美国许多学校都设有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奖学金核定的标准，不管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一概以成绩优胜决定。吴国桢的学习成绩，在待位研究生中，一直名列前茅，获介各布斯（JACOBS）奖学金，除原来每月80元的生活费外，每年尚有1200美元的额外收入，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清华同学中有困难的，还不时得到他的帮助。

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后期，尚有一段插曲。有一个人差一点改变了吴国桢一生命运的历程。

1925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者段祺瑞，在与直奉军阀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为了巩固皖系的地位，派其亲信陆军次长徐树铮，以中国政府专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到欧、美、日本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

徐树铮何许人也？现在的中青年人，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他13岁考中秀才，平时喜读兵书，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他亲诣袁府，上万言书，毛遂自荐。当时袁世凯正值丁忧谢客，将他的万言书交段祺瑞处理。段与徐树铮交谈后，大为欣赏，称赞徐说：

“先生之才，胜祺瑞十倍”，从此留在身边，参预军务大事。后来段祺瑞还把徐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陆军（与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是同学），回国后一直追随段祺瑞。辛亥革命时，清政府的 48 位大臣联名“上隆裕太后书”，劝清廷及早退位，这份奏稿，就是出自徐树铮的手笔。其子徐道邻，1937 年蒋经国从苏联返国后，应蒋介石之邀到溪口，一度担任过蒋经国的业师。

当徐树铮到达英国访问时，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正在工厂实习。徐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发现代表团缺少一位懂工程技术的翻译，而吴国柄在英国学的正是工程机械，除英语外，还通晓法语，又是老同学吴经明的长公子。因此，徐树铮立即任命吴国柄为少校副官长，随同代表团访问。

徐树铮一行，访问了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之后，于 1925 年 10 月 14 日抵达纽约港。当邮轮还在大西洋上航行时，吴国柄就在船上打了电报给他弟弟。吴国桢从 50 英里外的普林斯顿，特地赶到轮船码头来迎接他们。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已四年多，从未碰到过亲人，今天能够在纽约见到自己的哥哥，心里十分高兴。虽然在小学和中学时代，由于父亲经常夸奖他聪明，说吴国柄笨，为此，哥哥曾多次受到父亲的责打，那时，哥哥对自己，总是抱着亲而不悻的态度。

现在，兄弟俩各自成才，何况又是在异国相逢，小时候那些不愉快的事，哥哥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从一见面开始，兄弟俩没完没了地谈论别后的一切。徐树铮看见他们兄弟俩那份亲热劲儿，决定让吴国桢在代表团下榻的蒲拉栅旅馆（Plaza Hotel）留宿，徐还趁机询问吴国桢一些有关美国政界的情况和风土人情，吴对答如流，侃侃而谈，给徐树铮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徐树铮由欧洲动身到美国之前，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份电报，他出了一道题目：“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要公使馆通知学政治、经济、法

律的留学生，就此题目写成文章，供他研究。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就是政治，对写这类文章并不费力。很快写成一篇论文投寄公使馆应征。

徐树铮看到后，大加赞赏，认为在十几位应征的留学生中，吴的文章写得最好，能联系中国的情况，坦陈利弊得失，是个人才。因此，徐跟吴国柄讲，叫他打电报回家禀告乃父，说自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当时吴经明是徐树铮的部下），等他学成归国即完婚。岂料徐树铮回到北京没几天，在廊坊被人枪杀。倘若徐树铮不死，或者晚死几年，以徐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势，又是吴国桢父亲的顶头上司，吴很有可能成为徐树铮的“乘龙快婿”。如果是这样，那么，吴国桢的一生，或许将会是另一种境况。

1926年，吴国桢提交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获导师委员会一致通过，同意授予政治学博士学位。

授予学位的典礼在大礼堂举行，许多专家学者都应邀出席，气氛十分庄重。吴国桢身穿租用的博士服，缓缓走上舞台，面向来宾，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亲手把象征博士身份的绿带系在他的身上，然后再授予他证书。这时，在场的导师、教授、博士候选人和来宾，一齐热烈鼓掌，庆贺普林斯顿大学又出了一位博士。此时此刻，吴国桢无比激动，他感谢导师们辛勤的培养，感谢基金会对他的资助，使他得以完成学业，表示回国后，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社会。

在美国五年的留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趁横穿美国大陆返国的机会，吴国桢到美国中西部芝加哥等几个大都市和风景区游览了一番。1926年8月，吴国桢与其他9位留学的中国学生，乘麦金莱总统号启程返国。去美时，坐的虽是豪华的头等舱，心里却愁肠百结，莫可名状。如今，坐的是学生舱（票价与统舱一样，但与统舱隔开），就房间的陈设而言，不啻有天壤之别，但心情愉

快，豪情满怀。

他走上甲板，举目远望，白云朵朵，海天一色。此时此刻，吴国桢思绪如缕，浮想联翩。想到三周之后，就要回到北京，就要见到倚门而望的父母，然后走上社会，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以期大展宏图，不负所学。他手抚着栏杆，沉浸在美好的遐思之中。

第二章 受蒋知遇 平步青云

步入仕途

吴国桢归国后，首先回到北京，与分别五年的父母团聚。原先跟吴家同住一起的舅父朱和中，两年前已举家迁往广东，他与胡汉民等人赴苏联考察回来后，就担任了广东石井兵工厂的厂长。

当时，北京政局是由直、奉两系军阀联合统治。国民革命军在汀泗桥、贺胜桥一战，摧毁了吴佩孚的主力，前锋直指武昌城下，北洋军阀政府已岌岌可危，官吏们无不趁这最后的机会大捞一把，因此长时间地拖欠中下级官员们的薪饷。吴经明在北京无以为生，只好到广东去找朱和中，旋即担任了兵工厂的总务处长（吴国桢的母亲仍留在北京）。稍后，吴国桢只身来到上海，应聘担任地处吴淞一隅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在上海南京一带，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为适应外交事务日渐频繁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下，成立了江苏交涉公署（当时上海亦属江苏管辖），由郭泰祺任主任。郭之弟郭泰桢与吴国桢在美国同学，由于这重关系，郭旋即聘请他的这位年轻的同乡担任交涉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

吴国桢在任不过数月，却有幸与蒋介石的第三位妻子陈洁如